

个体与社会理想形态的现代化想象 ——论中国文学现代化中的两种价值取向

杨 鼎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在外来文化压力与传统文化引力所构成的张力场中, 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在进行着关于个体理想形态和社会理想形态的想象。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下, 在这两种构想的更替、排拒和纠缠中, 中国文学显示了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轨迹。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个体理想形态; 社会理想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5)01-0075-03

The Modernization Imagination abou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Ideal Pattern

YANG D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tension field composed by foreign culture press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ravity, Chinese literature had been imagining Chinese ideal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deal society pattern. In Chinese peculi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alternation, exclusion, entangle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imaginati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vealed its own locus towar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deal individual pattern; ideal society pattern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巨大的压力和引力下, 在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深刻的质疑、批判和反思中拉开帷幕的。在当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下, 这种批判和反思主要朝着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社会完善和个性健全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 所以,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有着个体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不同历史阶段, 关于社会 and 个体理想形态的想象又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随着国际大环境、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潮流的变化, 这两种价值取向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潮起潮落, 不停地进行着排拒、更替、转化和融合的运动, 展现了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化轨迹。

—

在新文学发展的早期, 最初觉醒起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是把个人的解放摆在第一位的。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 以西方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为指导, 重塑个体理想形态, 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价值取向。他们打着“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集结在《新青年》这块阵地周围, 大力抨击传统文化, 重新评价孔子, 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大规模的质疑和批判。所以, 在

此基础上诞生的“五四”新文学, 最初便具有了激进的个人主义色彩。个人解放是当时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主要诉求。周作人用“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 他认为新文学的根本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 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狂人”孤傲的激情和对思想自由的呼唤。在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 我们可以看到被旧的家庭制度下封闭的一代新青年的愤懑和呐喊; 尤其是郭沫若的《天狗》等诗歌中, “五四”时代那种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狂热激情被表达的淋漓尽致。

但是, 新文学阵营的几个主将虽然都提倡“个人解放”, 对这个口号以及对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关系的理解却是不尽相同的。胡适虽然也强调“小我”(作为个体的“我”)对“大我”(生活在社会中的“我”)的责任, 但是, 小我和大我的统一, 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统一。他在《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一文中认为, 易卜生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个人主义。周作人则提倡彻底的个人主义, 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 他说: “中国自‘五四’以来, 高唱群众运动社

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还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提倡个人解放”^[1],他这里所说的个人解放是指彻底的个人解放,即利己主义。而鲁迅、李大钊等人则倾向于与“社会解放”相联系的“个人解放”,即以个人的先觉醒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觉醒,或者说在个体理想形态的重塑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理想形态。正如他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新文学阵营的分解。

“五四”高潮期那种以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为代表的乐观昂扬和指点江山的时代豪情很快就过去了。自由主义的激情和空想,在中国这块严酷的现实土地上被摔得粉碎。在“五四”退潮期,苦闷、彷徨和迷惘气氛迅速笼罩了整个社会,新文学阵营原先并不明显的分歧开始明朗化:胡适带着对健全个人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的执著追求和想象远离了社会主潮;周作人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则把他一步步引向了“自己的园地”中去追求中国传统的隐士理想;传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又回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从类似“子君”和“狷生”的青年身上看到了单纯的个人解放追求的局限,社会解放象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横在了他们面前:子君走了,狷生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鲁迅的《伤逝》)?故人散了,留下的是一片苍茫(庐隐的《海滨故人》)!“五四”新文学在经历了一番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洗礼之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社会解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已经摆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面前。

二

社会革命的命题清晰地文学中表现出来,是1927年以后的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中国历史上翻过了它辉煌的一页。“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使热血青年们看到了单纯追求个人解放的局限,看到了以西方价值为旨归的个体理想的局限。这时,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经过艰难的反思和精神蜕变,开始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的社会理想形态的想象。在此基础上,原先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经过复杂的分化组合,“左翼文学”开始形成并迅速占据了文坛上的领导地位。与“五四”时期文学截然不同,左翼作家大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视社会,通过对社会形态和性质的分析(比如茅盾的《子夜》),以及对受压迫者命运的揭示,引导他们走上社会解放和变革的道路。社会解放在这里被摆在了第一位。左翼作家认为,离开社会的解放,个人的解放只能是空谈,个体只有在新的社会理想形态中找到其合适的位置,才能实现其生存的意义。这显然接受了由“五四”文学发展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但左翼作家把它推向了极端。在殷夫的《别了,我的哥哥》、《我们》等诗中所表现的新的群体

激奋情绪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对个体性的忽略。

同左翼作家不同,3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有一部分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坚守着独特的社会理想以及对个性的想象,以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在“自己的园地”里顽强地耕耘。京派的主要理论家朱光潜曾经说过:“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到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出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2]这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另一个方面的继承,是对个人与社会的解放的时代主题的另一种思考。他们坚信,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必须先个人心灵的净化做起。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对于淳朴人性和和谐社会理想的想象的热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感和无奈。

“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协”的成立,中国文学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以前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具有不同艺术主张的作家们纷纷改弦更张,加入到抗战文艺的大合唱之中。在国难当头、炮火连天的时刻,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回到了作家们身上。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作家们希望以抗日救国为契机,建立新的个体理想和民族灵魂。作家们再也无暇顾及个体的自由、完善与解放等似乎不合时宜的问题。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不仅仅代表自己一个人的声音,观察和分析问题无形中具有了宏观的眼光。社会价值取向几乎完全取代了个性价值取向,以致当梁实秋提出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时受到全方位的批评和责难。但是,在这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潮流下面,又潜伏着一些不利于文学健全发展的的问题,那就是文学的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的^[3]。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情感和传达政治立场”,^[4]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空洞的口号和滥情化的宣传充斥文坛。这样,由左翼文学发展起来的文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几乎完全取代个体价值取向之后,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新的、更成熟的文艺思潮的产生已在所难免。

三

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在“抗战”的爆发和全国政治文化的区域化隔离的形势下,关于社会和个体现代化主题的探讨也进入了分化展开的阶段。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在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之后,社会政治形势发生急遽逆转,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也为之一变。抗战初期受连胜论鼓动的昂扬激愤的社会心理已经慢慢沉静下来,中国社会原本存在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弊端和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且越来越明显。作家们的情绪随着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而转为沉郁苦闷。“热情凝固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的是新的苦闷和抑

郁”。^[5]作家们在苦闷和抑郁中开始了更深刻的思索——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也重新认识知识分子自己。这是“五四”以后,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次全面的反思,社会和个体现代化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作家们的思考。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作家们的创作已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朴素性和单纯性,不再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那样单纯地从个人视角批判社会,也不再象“左翼文学”和“国防文学”那样在社会学的宏观视野里使个体定位。而是转向多层次的思维、全方位的观察,他们把艺术的触角一方面伸向现实,一方面伸向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则向自己的内心深处掘进^[3],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忧患感、历史厚重性和心灵的深刻性。在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以及钱钟书的《围城》中,在张爱玲的《金锁记》、《连环套》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民族文化基因的遗传,也可以联想到人类在共同处境面前的困惑;既可以认识到群体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框架对个体欲望的桎梏,也可以体验到个体心灵艰难的颤动和无望的挣扎。经过“五四”以来 20 多年的艰难探索,冷静下来一想,人们忽然发现,民族传统还如影随形地附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革命的意义似乎变得那样虚妄,而个体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似乎是那样遥不可及。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在浑厚、博大与深邃的同时,又透出某种苍凉和自嘲的意味。这一切表明,这一时期作家们对个体和社会理想的想象正处于艰难的蜕变阶段,新的理想形态尚未确立,呈现出一种模糊而复杂的状态。

在解放区,文学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沿着“左翼”文学和“国防文学”对社会解放极端强调的道路,社会和个体的现代化在这里具有了新的意义。战争环境中,工农兵地位空前上升。站在新的阶级立场上,社会的完善和个性的健全不再是一种排拒关系,而是在新的政治理念的整合下,表现出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对新型社会理想的追求是这种理念的核心,完美健全的个性也在这种社会理念中有了自己明确的规

定性,比如无私、进取、乐观昂扬、牺牲精神等等。但与“五四”时期的个体理想相比,差别又不言而喻的。

这样,从“五四”前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对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探索经过了大起大落的几个轮回的探索,在 40 年代的解放区,通过新型政权力量的整合达到了统一。这种模式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9 年以后在整个大陆占了统治地位。但是,这种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上建立起来的统一,实际上是对个体性的压抑实现的。在 1978 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人心,这种理念和模式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和拷问。在新时期,世界格局和文化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在以西方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个体本位与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之间剧烈地波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的启蒙环境中,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无疑是占主流的;但进入 90 年代,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争论久而未决、“新保守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术氛围下,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也更加使人犹豫不决。这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创作与批评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学术界对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批评中,在由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的两种历史观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种学术视角的排拒、纠缠和融合,可以预见,这种纠缠将伴随于中国文学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

参考文献:

- [1]周作人.周作人书信[M].香港:香港实用书局,1967.33.
- [2]朱光潜.谈美·开场话[A].朱光潜全集(第二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
- [3]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8,449.
- [4]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A].胡风评论集(中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78.
- [5]臧克家.我的诗生活[M].上海:读书出版社,1943.